

俄罗斯的“门罗主义”评析

叶自成 刘东方

一、从“甩包袱”到俄罗斯的“门罗主义”

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政策，与其对外总政策一样，在1992—1995年间也有很大变化。

1992年初到1995年，在俄罗斯如何对待独联体国家的态度问题上，俄罗斯国内先后出现了4种影响较大的思潮。

第一种是“恐苏症”。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苏联时代俄罗斯虽然是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老大哥”，但实际上俄罗斯并没有从这种优越地位中得到任何实惠，俄罗斯成了苏联一些落后的加盟共和国的“奶牛”，这是使俄罗斯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重新回归欧洲并成为西方社会中的一员，俄罗斯应该像甩包袱那样彻底割断与中亚、外高加索等各国的经济联系，只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经济水平与俄罗斯接近的斯拉夫国家发展联系。“亲西方派”较多地体现了这种“甩包袱”的思想。

第二种是“俄罗斯帝国”论。这种思潮以日里诺夫斯基等为代表，主张在前苏联领土范围内巩固和发展俄罗斯国家，因为摩尔多瓦、高加索等地历史上都是俄罗斯领土，而中亚各国没有俄罗斯的“无私”援助就不能生存。因此，俄罗斯的利益要求俄罗斯“向南方冲刺”，避免俄罗斯受到来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威胁。军事和经济制裁将成为迫使外高加索、中亚各国重新归并俄罗斯的

手段。

第三种是欧亚邦联思潮，以俄统一和谐党领导人沙赫赖等为代表，主张在独联体国家内推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各国可以在保留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协调各方面的政策，建立经济共同体；邦联设立跨国的政治会议和安全会议，成立联合武装力量和防务联盟，设立邦联联合法庭；欧亚地区任何国家均可申请成为邦联成员国。欧亚邦联将类似欧洲联盟和北约组织的模式。这一设想在独联体一些国家中也有反映。

第四种是以俄共为代表的恢复原苏联的联盟的思潮。他们认为苏联解体是一个人为的历史性错误，对各族人民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应通过合法途径废除别洛韦日协定，并在改革、自愿和平等基础上恢复联盟国家。

1993年以前，这四种思潮以前两种对俄罗斯影响较大，使俄罗斯对独联体各国的外交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势：一方面是“放弃论”，俄不愿对独联体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不愿意独联体国家都留在卢布区，对试图留在卢布区的成员国提出苛刻条件；另一方面，俄罗斯又不断威胁一些成员国，如退出独联体，俄将提出领土划分问题，同时，俄还试图保留独联体统一的联合武装力量，在原苏联的遗产的继承和分割上不愿照顾其他成员国的利益等。但无论是“放弃论”还是“帝国论”，都不可能成为俄罗斯对独联体外交的主导政策。从“放弃论”来看，俄罗斯根本不可能“放弃”这

一地区。第一，俄罗斯境外有 2500—3000 万俄罗斯人，他们大多居住在独联体国家中；第二，独联体各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十分复杂，以至于实际上没有明确的边界作为外部边界，“放弃”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第三，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原苏联时期俄罗斯对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同时，也从中得到了许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时难以挤进西方市场，而从长远看，俄罗斯对中亚、外高加索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的需要也是很大的。同时，它们也是俄罗斯产品的巨大市场，放弃中亚、外高加索地区，会使俄罗斯遭到很大的经济损失；第四，独联体国家的局势会对俄罗斯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如果独联体国家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必然会造成难民潮，大批难民涌入无疑会给俄罗斯的经济复兴带来消极影响。所以，“放弃论”对俄罗斯是不可取的。

同时，“帝国论”也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因为第一，俄罗斯的国力已远不如昔日的苏联。苏联尚且不能长期维持自己的统治，更何况俄罗斯呢？第二，“帝国论”会使西方想起与苏联的对抗，使西方感到新的“威胁”，因此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第三，独联体各国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许多民族独立意识发展的结果，他们决不会再交出自己的独立和政治主权，听命于莫斯科的统治。因此，俄罗斯既无实力，又无外部条件来恢复俄罗斯帝国。无论是“放弃论”还是“帝国论”都注定不能成为长期主导俄罗斯对独联体政策的基本原则，必然会被更加务实的外交原则取代。实际上，1992 年年中，俄罗斯政权已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独联体。1992 年 3—4 月，叶利钦政权已经提出了把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作为俄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和优先原则。俄罗斯在 1992 年 5 月 15 日与乌兹别克、哈萨克、塔吉克、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 5 国签署集体安全条约是实践中重视与独联体国家

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独联体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发生在 1993—1994 年间，俄罗斯在此期间正式提出了比较成熟务实的对独联体的原则。这就是俄罗斯的新“门罗主义”。

1993 年，俄罗斯放弃了不干涉独联体成员国内部事务的立场，开始卷入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塔吉克的冲突。1993 年 2 月，叶利钦指出俄在保持独联体的稳定、制止这一地区的内部冲突方面应发挥“特殊作用”；10 月 20 日，俄外长科济列夫又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指望支持她在前苏联采取的维持和平的行动。但是，让那些不想同我们一起共同负担的国家不要再对我们讲关于新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威胁之类的话”^①。俄军队《红星报》也认为，俄罗斯“开始意识到它在苏联解体后时代的真正位置和角色了”^②。俄一些学者也指出，“在欧亚大陆没有比在独联体国家内部建立睦邻关系更迫切和更重大的问题了。……俄罗斯在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中不能仅限于起仲裁和调停作用，还应当起保护作用”^③。

科济列夫在 1994 年 1 月 19 日俄罗斯对前苏联境内各共和国对外政策会议上正式宣布了俄罗斯在这一地区“起着特殊的作用，负有特殊使命”，同时公开批评了“放弃论”和“帝国论”，认为“用武力恢复某种帝国主义后的广大地区”和“彻底离开前苏联境内各国”是两种极端错误的观点，“是违反历史和不现实的”，“其中任何一种观点都将导致南斯拉夫悲剧在前苏联地区重演”，而俄罗斯的新政策处于两者之间。他宣布，俄罗斯军队不会离开独联体地区。^④科济列夫同年 1 月还指出，俄罗斯的军事学说也认为，“为了俄罗斯联邦和其他独联体成员国的安全利益，可能有必要把俄联邦军队部署到境外”^⑤。叶利钦总统的另一名顾问谢·卡拉加诺夫也指出，俄罗斯将使“独联体国家在政治上保持各自的独立，但经济上受到控制”，俄罗斯

“不能采取仁慈的任它们为所欲为的政策”，“在这种模式中，俄罗斯将在独联体各国关系中扮演老大的角色”^⑥。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达米申则提出了“近外国家”的概念，认为独联体存在俄罗斯的切身利益，“俄罗斯的生存本身取决于同独联体国家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性质”^⑦。俄罗斯总统1995年9月14日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中明确指出，“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在俄罗斯政策中占有优先地位”，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关系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政治、军事、经济、人文和法制稳定；促使独联体国家成为政治和经济稳定、对俄罗斯奉行友好政策的国家；增强俄罗斯在苏联后空间建立新的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关系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加快独联体内的一体化进程”。

总之，在1993—1995年间，俄对独联体的政策已经演变为对独联体地区进行有限干涉、控制的政策。这一政策包括以下要点：

(1) 把独联体地区作为俄罗斯的具有切身利益、特殊利益和利益悠关的战略地区，并使之与俄罗斯的生存、安全、发展的利益相联系，宣布把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放在俄对外政策的第一位，高于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2) 承认独联体各国的政治利益，不直接干涉其政治和内部事务，但在军事、经济、文化上施加俄罗斯的影响；在独联体地区推行一体化政策；其长远目标是实现“欧亚邦联”或“欧亚联盟”。

(3) 宣布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具有维持和平、调解冲突、保护独联体各国不受外部敌人侵犯的特殊使命，在维持独联体地区局势的稳定上发挥特殊作用；

(4) 反对伊斯兰国家、西方国家过多地染指独联体国家的事务，反对在这一地区发展有损俄罗斯的“特殊利益”的双边或多边关系。

二、俄罗斯推行“门罗主义”战略的主要措施

在推行近邻外交和“门罗主义”战略的过程中，俄罗斯以强化在独联体地区的军事存在为核心，以推行经济一体化为动力，以散居在独联体各国的2500万俄罗斯族居民为其纽带，采用恩威并重，既强硬又灵活，以达到其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和作用的目的。

(1) 在军事方面，以区域多边军事合作和双边合作为主。在独联体存在初期，俄罗斯一度想维持独联体各国的统一武装力量，由俄罗斯控制和指挥。在这一想法被证明不切实际后，俄改而推行区域多边和双边的军事合作。1992年5月，俄与亚美尼亚和中亚4国签署了集体安全条约；1993年下半年，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也宣布加入这一条约。土库曼斯坦没有加入这一条约，但却与俄罗斯签定了广泛的军事合作的双边条约，决定建立俄土联合军队，共同保卫土—阿、土—伊边界；俄与摩尔多瓦也达成了俄军驻扎在其境内的德涅斯特河沿岸的14集团军的地位的协定。此外，俄还在独联体国家驻军10多万，保留了30多个军事基地。俄军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都获得了长期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利；俄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建立统一的战略防御空间，成立共同的宇航指挥中心，俄租赁哈萨克的拜科努尔航天基地等协议；处于战乱中的塔吉克，实际上处于俄军的控制和保护之下，俄边防军2.4万人驻守在塔吉克—阿富汗边界，以俄军第201摩托步兵师为基础的独联体维和部队驻守在塔吉克首都。俄军还以维和部队的面目出现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长期争斗不休的纳卡地区。

1995年初，俄又与白俄罗斯达成了共同保卫白俄罗斯边界等协定，与哈萨克斯坦签订了共同组建联合武装力量、共同守卫外部

边界的协议。至此，除乌克兰外，俄边防军实际上单独或与所在国共同承担了保卫独联体外部边界的重任，并在独联体充当维持和平的主要力量。

俄军的这种军事存在是俄与独联体国家关系发展最快、进展最大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一个领域。它是支撑俄罗斯在独联体内部发挥特殊和重大作用的第一根支柱。这种军事存在当然首先是为了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的安全利益，但它也具有微妙的政治意义。

(2) 在经济方面，俄罗斯实行自己在独联体地区的“首领地位”和实行经济控制的主要政策是，坚持取消对商品流通的种种限制，为所有国家资本参与一体化创造条件，用工业及其他资产换取贷款，积极支持资本的相互渗透；建立有效的相互结算体制，起先是双边的，以后可能成立带有储备金的支付同盟。但同时要避免金融系统的完全联合；大力支持资本向对俄罗斯有益的领域出口，支持在州、地区、城市和企业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

在1992—1993年间，俄罗斯在“甩包袱”思想的指导下，在经济上实行的各顾各的政策。独联体成员国经济大幅度下降，俄罗斯经济也受到很大损失。从1993年下半年起，独联体各国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1993年5月，俄罗斯与8个独联体国家签订了加速经济一体化宣言；1993年9月，11个成员国草签了建立经济联盟的条约，1994年9月，以俄为首又成立了跨国经济委员会。俄外长科济列夫认为，俄国应当在这一地区起经济改革的火车头和引力中心的作用，并推动独联体在经济上向欧洲联盟的方向发展。为此，俄从1994年起增加了对独联体各国的优惠和补贴，拨出4000亿卢布用于补贴各国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对塔吉克等还给予特别优惠，仅1994年就给了1200亿卢布的贷款。

1995年以来，俄又大力推进与独联体各国的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关系，并取得实质

性进展。1995年初，独联体各国确定了统一海关法的基本原则，进一步落实经济联盟的条款，俄罗斯还与哈萨克、白俄罗斯达成了建立三国关税联盟的协议，并将分阶段建立“支付联盟”，与塔吉克签订了加深经济合作和发展一体化关系的协定，并使塔吉克正式保留在卢布区内。

(3) 在独联体各国的俄罗斯居民地位问题上，俄罗斯以保护境外俄罗斯人的利益为由，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多方向向独联体各国渗透。在政治上，俄罗斯提出给予居住在各国的俄罗斯居民双重国籍，并从1994年起先后与土库曼、白俄罗斯、哈萨克等国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从而解决了一个妨碍俄罗斯与各国发展关系的重大障碍。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稳定俄族人心，但也为俄罗斯多了一个因维护居住在国外的“俄罗斯公民”的利益而干预所在国事务的借口。

在文化上，继续推行俄语优先的政策，并向非俄罗斯的俄语大学和文化单位提供资助和费用；投入更多资金在俄罗斯大学中为独联体各国培养人才和专家；创办专门的广播电台、电视节目和出版物，向散居在各地的俄族人提供文化产品，并通过他们继续在独联体各国传播俄罗斯文化；

在经济方面，把向独联体各国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经济优惠与他们对俄族居民的态度联系起来；俄罗斯的所有贷款都附有一个条件，即20%—30%的贷款必须用于满足俄族居民的需要；同时，俄罗斯还在一些国家中建立救济和重新安置因民族冲突而陷于困境的俄族居民的机制。

三、俄罗斯推行“门罗主义”的矛盾和障碍

俄罗斯在独联体范围内推行“门罗主义”的最大障碍是实力仅次于她的乌克兰。首先，乌俄两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归属和黑海

舰队的划分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其次，乌克兰奉行中立政策，拒绝与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或防御联盟，更不能接受俄罗斯在其境内建立或使用军事基地的要求；乌克兰既反对北约东扩，也反对参加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军事同盟对抗北约；同时，乌克兰的军事学说把俄罗斯视为主要军事威胁和潜在敌人。

第二，在中亚地区推行“门罗主义”也有双重矛盾。一方面，俄罗斯国内对是否与中亚五国实行一体化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与中亚五国实行一体化政策的人和要求撤出该地区的人各讲各的理由，而且都不无道理。另一方面，中亚国家中对俄罗斯的“门罗主义”也有两种倾向。纳扎尔巴耶夫虽然批评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关于俄在独联体地区有特殊利益的话使人想起30年代希特勒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政策，但事实上哈萨克对俄罗斯加强在中亚的一体化倾向是赞同的，纳扎尔巴耶夫本人还积极主张成立欧亚联盟。而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在这一方面则显得犹豫不决。它们既希望避免受俄罗斯的控制，又希望更多地发展与土耳其、伊朗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联系，并且自有打算。此外，摩尔多瓦则坚决要求俄军从德涅斯特河沿岸撤出，并且拒绝参加以俄为中心的集体安全条约。

最后，西方国家也决不承认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的“特殊作用”和扮演“宪兵”角色。对俄罗斯把这一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抱有一定的戒心。西方尤其反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军事和政治上结盟。尽管一些西方人士也承认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存在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民族利益，但西方的利益“不允许俄罗斯完全主宰原苏联地区”。西方要求派观察员参加和监督俄罗斯在独联体的维和行动，把乌克兰视为欧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主权和领土完整上对乌克兰给予明确的支持，并且在经济援助上给予更多的许诺，美国与乌克兰关系有较大发展。这些都对

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四、对俄罗斯的“门罗主义”的一些评析

俄罗斯的“门罗主义”还在1993年7月就受到了西方一些学者的批评。美国记者道格拉斯·斯坦格林在其发表的《莫斯科采用门罗主义》的文章中，指责“俄罗斯正在利用它的能源、财力和军队争取在前苏联帝国居主宰地位”，认为俄罗斯“仍想在它1991年以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辽阔土地上发号施令”。^⑧

在独联体国家，俄罗斯的“门罗主义”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1993年，乌克兰议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帕夫利奇科认为，俄罗斯试图以石油为武器，想使独联体国家“乖乖地留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俄罗斯不想失去其帝国主义幻想”。^⑨

哈萨克斯坦总统顾问乌·卡谢诺夫也对俄罗斯的“门罗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把俄罗斯对前苏联共和国的政策称为“科济列夫主义”，认为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科济列夫主义”的实质是，如果俄罗斯认为其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它有权对前苏联境内国家采取任何行动，显然也包括武装入侵，……目的是使这些国家重新受制于俄罗斯，而且随后使俄罗斯变成前苏联帝国的某些变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俄罗斯力图在独联体国家中制造混乱，挑起冲突，使其政局不稳，从而使俄罗斯能“合法”地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和主权”。^⑩

“门罗主义”在俄罗斯内部也遭到了批评。俄地缘政治和军事预测中心主任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在批评这一主张时指出，俄罗斯的“门罗主义”有两个逻辑错误，一是误以为西方和外部世界会对俄罗斯的帝国政策持宽容态度，二是以为俄罗斯的控制能保持地区稳定。而实际上，这种哲学就会导致与宣

称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俄罗斯的真正民族利益要求采取与‘门罗主义’截然不同的政策”。^①

那么,对俄罗斯的“门罗主义”应作如何评析呢?我们认为,俄罗斯的“门罗主义”有两重性。

一方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确具有极为重要的利益。大量境外俄语居民的地位和利益,独联体各国边界形成的复杂性,原苏联时期与各国形成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等,以及俄罗斯作为该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的“超级大国”,的确使俄罗斯在该地区能发挥独特的和必要的作用。经济一体化,控制该地区战乱的扩大和蔓延,维护该地区的稳定,这不仅符合俄罗斯的利益,而且也符合该地区与世界和平的利益。所以,不应把俄罗斯在该地区发挥独特作用一概指斥为“帝国野心”。也就是说,应在上述范围内承认俄罗斯的“特殊作用”。

另一方面,这一主张又带有一定的“帝国”倾向,主要表现为公开把独联体地区视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这使人想起二战结束时西方大国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的“先例”,而划分势力范围是“冷战”思维的主要内容,也是无视各国独立、主权的一种体现;其次,俄罗斯的“门罗主义”的军事干预的色彩较浓,实际上把保持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作为实现俄罗斯特殊作用的基础,有扮演地区宪兵的趋势。这在1993年俄军卷入格鲁吉亚、插手摩尔多瓦和阿塞拜疆以及塔吉克内战有充分的表现;再次,俄罗斯利用边界划分和俄语居民的特殊地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并施加压力的做法也有过火的地方。正如俄学者指出的,“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关系紧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莫斯科对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否则,1992年至1994年的许多复杂情况都可以避免”,并且“使俄语居民问题成为国内政治赌博和为

对外政治野心辩解的因素”。

因此,对俄罗斯的“门罗主义”也应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支持俄罗斯在该地区维持和平与稳定、促进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努力;二是对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外交战略的发展趋向保持一定的警惕。

尤其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的“门罗主义”中的“近邻”概念,与勃列日涅夫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概念的确有相似之处。借口保护俄罗斯的特殊利益而对其他独联体国家进行军事政治干预的可能性将长期存在。

最后,鉴于俄罗斯的“门罗主义”在支撑俄罗斯的大国外交战略上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主张还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发挥主导作用。因为没有俄罗斯的“门罗主义”,没有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独特的作用,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就会失去光彩。

注释:

①米格拉尼扬《俄罗斯和前苏联境内各国的关系》,俄《独立报》,1994年1月12日。

②见1993年10月20日俄《消息报》。

③见1993年11月20日俄《红星报》。

④普利亚伊斯《俄罗斯的特点及其对外政策》,俄《独立报》1993年11月19日。

⑤科济列夫在俄对前苏联境内各共和国对外政策会议上的讲话,见俄通社—塔斯社1994年1月19日电讯稿。

⑥谢·卡拉加诺夫《俄罗斯找到了独立的对外政策》,英《金融时报》1994年3月21日。

⑦阿达米申《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邻近外国、遥远外国及民族利益》,俄《独立报》1993年6月15日。

⑧⑨道格拉斯·斯坦格林:《莫斯科采用门罗主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3年7月13日。

⑩卡谢诺夫:《“科济列夫主义”——俄罗斯版的“门罗主义”》(俄)《独立报》1994年3月12日。

⑪阿尔巴托夫:《俄罗斯:90年代的国家安全》,(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4年第7期。